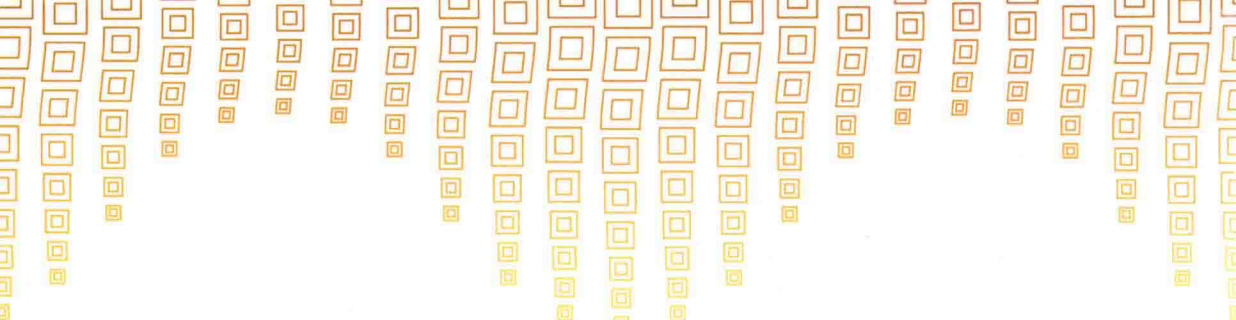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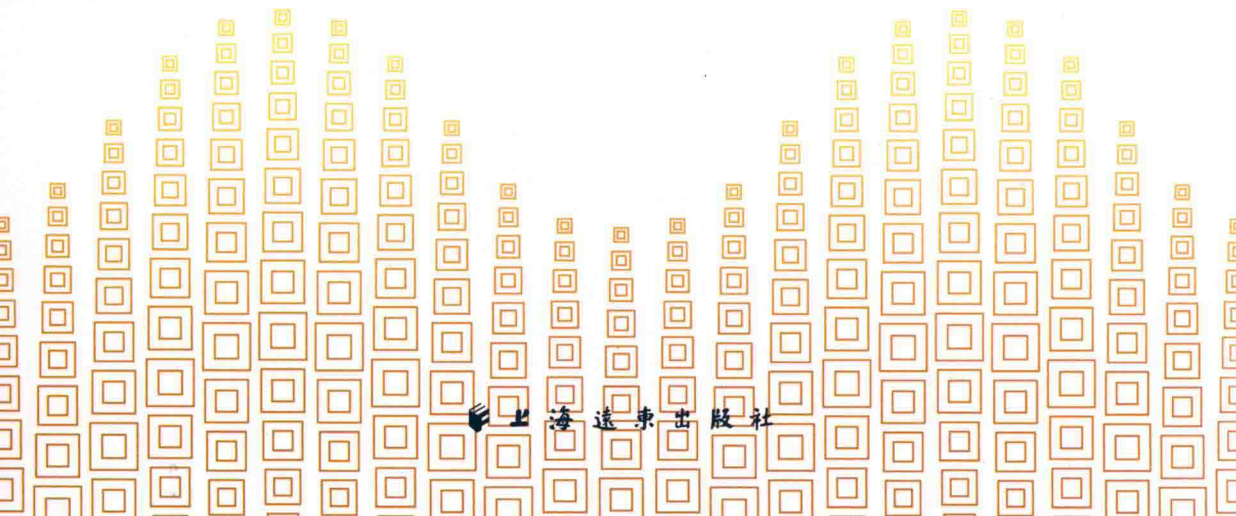




以百姓心为心

老子政治哲学

叶自成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以百姓心为心

老子政治哲学

叶自成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以百姓心为心:老子政治哲学/叶自成著.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8

ISBN 978-7-5476-1383-2

I. ①以… II. ①叶… III. ①老子—政治哲学—研究
IV. ①B223.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42901 号

策 划 曹 建

责任编辑 徐婧华

封面设计 张晶灵

以百姓心为心:老子政治哲学

叶自成 著

出 版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235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浙江临安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35

字 数 511,000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6-1383-2 / B·11

定 价 96.00 元



叶自成，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华夏主义”“陆权战略”“柔力量”“中国价值观”的倡导者。现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著述有：

《华夏主义——华夏体系五百年的大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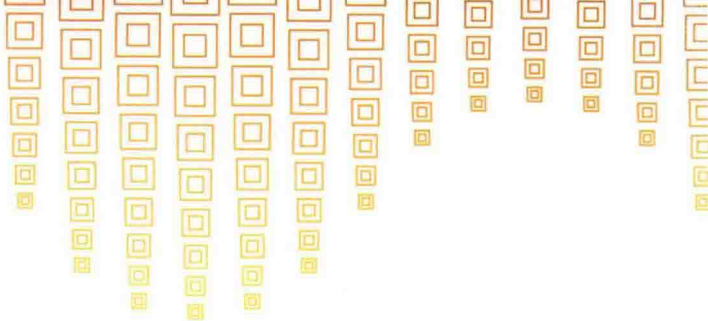
人民出版社，2013

《中国崛起——华夏体系五百年的大历史》

人民出版社，2013

《中国大战略》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圣人恒无心 以百姓心为心

老子的这句话为什么会被四次引用？

《老子》其实是一部治国理政的著作

在老子看来，实现百姓心，
就是政治的本质；
实现百姓心的政治，
就是人类最好的政治。

系统完整论述老子的政治哲学体系
探寻“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根源

导 言

从“以百姓心为心”到“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价值观

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系列重要讲话,形成了一整套治国理政思想,这一思想的核心,就是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深厚的思想根源。这一思想根源,又以老子的政治哲学为最深厚。

老子是第一个提出以百姓心为心的政治思想家,并且形成了以百姓心为心的政治哲学体系。以执政者为中心,还是以百姓为中心,只要看看《老子》第30章、第31章就清楚了。打了胜仗,对执政者来说,是好事,但在老子看来,即使是自卫战争得胜了,也应该以悲哀泣之,以丧礼处之。因为,对百姓来说,即使是胜仗,但“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只有以百姓心为心,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在政道方面,《老子》第49章明确提出,圣人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就是说,执政者不应该有与百姓不同的主观愿望,实现百姓所向往的美好生活,就是执政者永远的任务;第57章又提出,要实现百姓心为心,就必须无为而治,让百姓自富自化自朴自正;第74章还提出,要根据百姓的意愿制定法律,以法治国要以百姓的愿望为中心。

在德道方面,老子在第2章对执政者明确提出了为官之德,就是执政者必须为百姓服务,就是生而不有,作而不辞,为而不恃,功成不居,不与百姓争利,对百姓要讲言善信(第8章),对百姓要为而不争(第81章)。

在治道方面,老子认为国家机器只是服务于百姓的公器,第32章明确提出

了百姓自治与政府管理的分工与权限,提出知止不殆的观点,国家要承担社会发展的公共管理职能,特别是要救助百姓中的弱势群体;第79章提出损有余补不足的思想;第54章还提出了身、家、乡、国、天下一体的治理体系,治国要从百姓的身心健康开始;老子在第17章还提出了百姓评价政治的功能。

在术道方面,《老子》第49章和第66章提出了执政者的群众路线,认为治国理政必须处理好执政者与百姓的关系,就是民上与民下的关系,民前与民后的关系。执政者要在上面领导百姓,就必须深入百姓当中,政令要反映百姓的要求(其在民前也,必身后之;其在民上也,以言下之);执政者要带领百姓前进,就必须经常跟在百姓后面,听听百姓说什么,看看百姓在做什么。执政者要和百姓“浑其心”,与百姓打成一片,才能得到天下百姓的“乐推而不厌”。

在器道方面,老子在第80章认为,要实现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必须解决百姓的民生问题,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第72章)。为百姓提供丰富的物质产品,满足人们正常的生活需求,因此要有车有船,食要甘,服要美,居要安,俗要乐(第80章)。

所以,老子的政治哲学,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百姓心为心的政治哲学体系,它从政道、德道、治道、术道、器道五个方面提出了国家政治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在老子看来,实现百姓心,就是政治的本质;实现百姓心的政治,就是人类最好的政治。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政思想,与老子以百姓心为心的政治哲学体系,有直接的传承与发展关系。

习近平早在1989年1月福建宁德市委书记的任上,就曾在《党员基本功——密切联系群众》的文章中,第一次引用“以百姓心为心”;2007年,浙江省委书记任上的习近平所写的《之江新语》,再次引用“以百姓心为心”;2012年十八大担任总书记的习近平在与记者见面时表达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党的奋斗目标”,“以百姓心为心”呼之欲出;2014年国庆讲话,习近平再次引用“以百姓心为心”,表示要倾听人民心声,汲取人民智慧,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初步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政思想;2015年6月12日在纪念陈云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第四次引用“以百姓心

为心”,要求努力解民忧,办实事,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汇聚强大力量。

2016年,习近平明确地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舆论观、以人民为中心的哲学社会科学观、以人民为中心的环境保护观、以人民为中心的党的政治立场观、以人民为中心的衡量标准观,认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这些既是对老子以百姓心为心的传承,又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老子思想的创新性发展。十九大又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政思想。

所以我们可以说,老子的以百姓心为心的政治哲学体系,对今天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价值观,有重要的思想借鉴意义。

自序

2500年之叹：老子政治哲学 竟无全解！

《老子》一书问世已经2500多年。

《老子》影响深远广大，被无数人议论评述过，有关《老子》的注解、研究成果以及著作论文何止成千上万矣！这些论述对传播老子的思想，使老子思想与孔子思想一起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两大支柱，对于启迪道家思想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厥功至伟。

然而遗憾的是，虽然老子的政治思想不断被人论及，有些论其“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之道，有些论其伦理，有些论其治道，有些论其养生之道，有些论其兵道，有些论其天下之道，但2500多年来，竟无一人、无一书全面而精确地论述过老子政治哲学体系的“政道、德道、治道、术道、器道”精华。甚至可以说，即使把这些老子政治思想的全部论述集合起来，也不能说论说全面和精确了。下面择其要而概之。

魏晋之前关于老子政治哲学的主要评述

杨朱学派发展了老子“道法自然、民四自”中的个人主义的萌芽，从百姓和民众角度，张个人权利保障大旗，强调“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个人主义精神，是中国思想文化界难得的保护个人权利的思想财富。然而，杨朱忽略了执政者无私与百姓有私的不同，老子的“道法自然、民四自”包含了个人自由与个人权利思想，但也讲了民要“自知”“自胜”“自爱”，讲了执政者作而不辞、为而不恃、功成不居、无私等品德；只讲人的自私的合理的一面，未讲自私背后的欲望的负面性。这是杨朱的片面性。

庄子(约前 369—前 286 年)是道家的大思想家，庄子学派创始人，对后世道家 and 道教影响也很大。庄子发展了老子的个人精神自由的思想内容，发展了老子的自然之道和全生之道。但在政治思想方面，庄子学派就走歪了路，偏离了老子“以百姓心为心”“民四自”“以正治国”“积极无为”的思想路线，主张“无为不治、逃世隐逸、消极无为”的处世方式。

韩非子(约前 280—前 233 年)是战国后期的思想家，他有《解老》《喻老》两文对老子的思想进行注解。韩非子对老子的道有十分深刻的理解，认为道是万物生成的根本动力，是万理构成形式的总汇；理是构成万物的外在形式，道是生成万物的根本原因。对于老子的政治思想，韩非子比较重视老子的“术”，对以法治国、定分止争等治国之道也有深刻见解。但总的来说，韩非子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以君心为心”，完全偏离了老子政治思想中“以民心为心”“民四自”“无为而治”等政道。

河上公，战国时期的隐士，按司马迁的说法，是乐毅(燕齐之战时燕军主帅，燕齐之战发生在前 284 年)的后代乐臣公的老师，“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史记·乐毅列传》)。他所注释的《老子章句》是历史上流传影响最广大的一本著作。河上公代表了黄老学派的主要思想，以黄老解老，也是最早提出“用道治国”的思想家，对老子的治道、治术有发展，对民自治的思想有所涉及，认为老子政治思想的特点是“贵清静而民自定”，明确

说《老子》一书就是“谓经术政教之道也”。但他把治国与治身并提，而以治身为要，认为“非常道”就是“非自然长生之道”；不仅把老子之道解偏了，也显然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来论述治国治身；直接以养生思想来解释老子的政治思想，对后来道教的养身成仙之术有影响。^①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黄帝四经》是黄老学派的重要著作。战国时期的黄老学派，大量引用老子的思想，并采各家之长，在引法入道、道生法、刚柔相济方面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使老子的政治思想更落实为治道，并直接影响了汉初的文景之治。但它把天地人与鬼神并举，主张“大国得道得以兼并天下”，认为攻夺他国后要拆毁它的城郭，焚毁它的钟鼓，均分它的资财，散居其子女后代，分割其土地。如果不彻底灭亡这些国家，则经过征伐的国家会重新兴起，所以应当一鼓作气，使其成为废墟。当敌国由强变弱时，就应该乘机讨伐，具有侵略性。《黄帝四经·经法·君正》又主张君主对百姓的统治权，认为前四年要对百姓好，第五年开始就要以法来治理百姓，第六年让百姓对君主产生敬畏，第七年就指挥百姓出征作战。这些主动攻伐、以君心为心、君臣共治、以术治国的政治思想，都偏离了老子的“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以百姓心为心”“民四自”“民圣共治”“以正治国”的主线。^②

《淮南子》是汉初黄老道家的代表作，其中有《原道训》和《道应训》两卷解老。《原道训》主要从形而上解说老子的天道，其中不乏对老子政治思想的深刻理解。比如“得在时，不在争；治在道，不在圣”“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治而无不治也。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道应训》则讲了50个故事来说明政道，十分生动形象。其中对老子政治思想的理解十分准确，几乎把老子所有的话都用来解释春秋战国时的政治斗争，可以说是悟透了老子的政治思想的奥妙，在解老各家中是把老子与政治联系最紧密的。比如对“知其雄守其雌”“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解释等。《主术训》一卷则集中了

① 《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0、12页。

② 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13、314、40、55页。

黄老道家的治国之术的精华。第一次对什么是无为进行了明确的界定,认为无为而治就是按照自然和社会规律办事。治国之本在于安民,“民者,国之本也”。还主张“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对如何用众人之力、乘众人之势以及“圣人兼而用之,故无弃才”,做了精彩的发挥,对老子政治思想的精华有所把握。但是,作者窜入了儒家思想来解道,又走偏了。比如“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把它理解为不用法律而用礼法;对道术的解说掩盖了政道的光辉,术变成了君王驭下和驭民之术。虽然篇篇故事都在论政说道,但对什么是“以百姓心为心”、什么是“民四自”、什么是“道法自然”等老子政治思想的精华没有进行解释。它的“主术”,终究也不过是君王的统治之术,而不是老子以民心为心、民自治之政道。

张陵(?—177年)是道教创始人,著有《老子想尔注》。东汉末年的太平道、五斗米道,曾以《老子想尔注》为旗帜,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有严密组织纪律和行动纲领、最早及最接近现代政党组织的政治实体,发动了农民军起义,而且有几次五斗米道领导的建立政权并施行其政纲的政治实践。但在《老子想尔注》中,找不到多少政治思想的内容,甚至连《老子》书中严厉批判当权统治者的内容都没有。综观该书,只有少数几处涉及政治,如解释“政善治”时说“人君理国,常当法道为政,则致治”。但书中大多只是以老子的长生养生思想为宗旨,教人如何修炼得道成仙的内容;书中的术,也不是政治之术,而是养生长生术,与老子的政治思想几乎没有关联。^①

王弼(226—249年),是魏晋时期的思想家,虽然年仅24岁就去世,但他是一个早熟的大才子,有《易》《老》两本传世的注本。今本《老子》主要是在他的注本基础上变化而来的。他的《老子注》虽有融儒入老之嫌,但在各种解老著作中是注解得最早、最好、最有系统的,所以成了流传最广泛的版本。王弼对传播老子思想厥功至伟,也是对中华民族的一大贡献。但王弼对老子思想的阐释以本体论和人生论为多,主张以无为体、以有为用,主张崇本息末,并用崇本息末的精神注解老子的思想,对老子的政治哲学涉及不多。对第49章的“圣

^① 刘昭瑞:《〈老子想尔注〉导读与译注》,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9页。

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的解释较精准。注解第 57 章时，虽然提出了“以道治国”的概念，但他对“以正治国、以奇用兵”的解释显然背离于老子的原意，故不为后人所取；而对“民四自”的思想，仅以“崇本息末”四字简论，虽然也可以说“民四自”是政治之本，但没能阐明其要义。

清末及民国对老子政治哲学的主要论述

魏源对老子的思想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曾著《老子本义》，对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有系统的评述。他认为“圣人经世之书，而《老子》救世书也”，特别强调老子的“我无为而民自化”的思想。魏源认为老子思想的主旨是无欲无为无名，也看到了老子之道与老子之术的区别。他认为老子之道，以无为无欲为本，阴柔为用，老子后学和末流，或得其体而去其用，或得其用而去其体，产生了许多弊病，而且还批评庄子离用以为体。魏源尤其批驳了老子思想是权谋的说法，他认为，阴之道虽柔，而其机则杀，故学之而善者则清静慈祥，不善者则深刻坚忍。在政治思想方面，魏源认为黄老学派的思想与老子近，而庄子学派离老子远。^① 魏源对老子政治哲学的理解是很准确、简明的，高出后来的许多所谓“大师”，但魏源也没有对老子政治哲学的内涵进行系统的整理。

章太炎为朋友写的《〈老子政治思想概论〉序》中，虽对老子的思想不无赞赏之言，曾言老子“以内圣外王之道自持”，但最后把老子思想归于“术”之类，不仅韩非子得其政治之术，其他各家也是各取其术。“余尝谓老子如大医，遍列方齐，寒执攻守杂陈而不相害，用之者则因其材性，与其时之所宜，终不能尽取也。其言有甚近民治者，又有倾于君主独裁者，观韩非《扬权篇》，义亦如是。是所谓遍列方齐，任人用之者也。汉世传其术者甚众，陈平得之为阴谋，盖公得之为清静，汲黯得之为卓行，司马迁父子得之为直笔，数子者材性不同，而各以成其用。与夫墨氏之徒，沾沾守一隅之术者异矣。与民治之与独裁，其道相

^① 魏源：《老子本义》，商务印书馆 1934 年版，1-6 页。

反,独孝文能兼用之。……盖孝文为能得其一二,后之晓此者寡矣。”^①章太炎认为《老子》一书,犹如一个大药铺,里面什么药都有,人们可以根据自己情况各取所需。我认为,首先,这一评论把老子的道、德、术混为一谈,未明老子“道法自然、民四自”之政道,没有分清道与术的区别;其次,他同时认为老子主张民治,又主张独裁,这也是十分奇特的观点。在《诸子学略说·原道》篇中,章太炎发表了两个独特的观点:一是认为汉文帝仅得老子十分之一二,并不是老子的道治;二是认为诸葛亮治蜀,更近于老子治术,“老氏所经,盖尽于此”^②。

梁启超先生著有《先秦政治思想史》,其中有两章对道家的政治思想进行讨论。梁先生的研究也是老庄混谈,以庄解老,所以认为道家“必在绝对放任之下,社会乃能复归于自然,故其对于政治,极力地排斥干涉主义”,“所谓文明或文化者,道家一切悉认为罪恶之源,寿故文字,罪恶也;智识,罪恶也;艺术,罪恶也;礼俗,罪恶也;法律,罪恶也;政府,罪恶也;乃至道德条件,皆罪恶也”。不能厘清老子与庄子的重大区别,认为道家都是“绝对自由”“无治主义”,把“无为”理解为“不要管他”,认为“道家之大惑,在以人与物同视”^③。总的来说,梁先生对老子的政治思想研究不够深入。

胡适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开中国以西方方法研究中国哲学思想的先河。胡适先生认为,道家的中心思想是自然变化的宇宙观、善生保真的人生观、放任无为的政治观;又说道家的政治思想不为物先,主张不以人易天,天是自然,人是人功,不革命,但也不反革命,一切推自然之势,都可以叫作无为。胡适对《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后期的道家的著作有比较深入的探讨。^④ 胡适先生从杂家的角度来分析道家,一是强调无为就是放任,二是强调无为就是不为物先。在对老子政治思想的论述中,胡适有三个观点很鲜明:其一是说老子是“革命家老子”,说老子的思想是“革命的政治哲学”,“要毁坏一切文物制度”;其二是说老子的无为等同于西方“极端的放任”;其三是说老子的政治思

① 章太炎:《章太炎自述》,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65-166 页。

② 章太炎:《诸子学略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99-100 页。

③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38、140、142 页。

④ 胡适:《胡适讲国学》,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83、86、100 页。

想是要寻求问题的根本解决,就是推翻传统的天道观。胡适先生对老子的评价,相比那些说老子思想保守消极、为奴隶主阶层服务等评论,是非常高也是非常肯定的。但胡适前面的两个观点似乎都有点“过”,值得商榷。对老子的“以民心为心”“民四自”“损补抑举”的核心思想均无涉及,也是缺陷。^①

1919年5月,高一涵先生发表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上的文章,直接以《老子的政治哲学》为标题,主题十分明确。高先生的文章把老子的政治哲学概括为“去兵、尚俭、无为、尚愚”四个方面。他以西方的自然法和放任主义解释老子,认为西方的放任在于个人,老子的放任在于自然;又认为老子把社会的罪恶归于知识、文物制度,“把文物制度一扫而空,使天地万物回复到无的境界——这就是老子政治哲学的根本观念”;认为老子的政治哲学就是反知识、反文化、反国家,所以老子只是一个“空想大家”。这篇文章对老子政治哲学的精华一知半解。^②

1933年,孙思防先生出版了《老子政治思想概论》,这是国内第一本论述老子政治思想的书。虽然这也是一本小册子,约五万字,但内容比较简练,其中的老子之无为论、老子之放任论、老子之民本论、老子之法术论、老子之互助论、老子之弭战论、老子之农村论等章,内容比较突出老子的政治思想。孙思防先生是最早明确《老子》是一本政治学专著的学者,他明确指出,有人以为老子是神仙家、权术家、道德家、刑名家,这些都不对,老子实际上“志在明自然之理,达人生之情,将有以施诸世,用哲学家、道德家而以政治家为归者也”,“中国言政治者,宜莫精于老子”。老子“消极无为”和“积极无为”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孙思防先生早在80多年前就已经明确提出了,认为“无为而无不为,此其积极之义;无为,此其消极之义也”。虽然他提出的“消极无为”和“积极无为”与笔者在本书阐释的定义有很大不同,但作者遍读诸家,皆没有发现有此区分者,孙先生不谓80多年前的知音乎?只此一点,就必须得说,孙思防先生对老

① 胡适:《胡适讲国学》,第120、121、128页;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重庆出版社2013年版,第46-47页。

② 高一涵:《老子的政治哲学》,载陈独秀、李大钊等编《新青年精粹》(2卷),中国画报出版社2013年版,第327页。

子的政治思想很有见地！当然，这本小册子对老子政治思想的内容也没能全面展开论述，对老子的“民四自”，孙书只以“简法、轻刑”解释为“放任”，也是一憾事。^①

李石岑先生于1934出版的《中国哲学十讲》中有一讲，专门讲道家的宇宙观，其中的“自然主义”涉及无为无不为的政治国。他认为老子思想的主旨是自然主义，根本思想是无为无不为，尤其重视老子的“民四自”思想；但又认为老子在杨子、庄子之后，自然主义是“杨子而庄子，由庄子而老子”。又说“《论语》是《老子》思想的主源”。对道家的评价也很低，认为“所给予中国的影响却是极坏极坏的，不奋斗——无为、无事，不进取——知足、知止，不抵抗——不争，乃至一切言论行事，完全走入消极颓废一途，都是道家哲学之赐”，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②

钱穆先生一直怀疑有没有老子这个人，认为老子的重要观点“几乎全从《庄子》引申出来”。在《道家政治思想》一文的论述中，通篇都是在以庄论老。钱先生认为，老子就是想要支配人，“一切从人事形势利害得失上作实际的打算”，“对人类社会抱有大野心”。庄子无私，老子却要成其私。在他看来，老子的圣人、天道不仅不善不慈，而且很可怕，有私欲，玩阴谋，玩弄天下百姓，“老子书中圣人之可怕，首在其存心之不仁，又在其窥破了天道，于是有圣人之权术”，老子“最尚自然，但还是最功利的；最宽慈，但还是最打算的”。可见他对老子的政治思想曲解甚多。钱先生以庄论老、以儒批老，所以不能对老子的政治思想进行客观的论述。但钱先生认为老子重视民众的地位，民众不可轻，庄子是玄想家，老子是实际家。“庄子思想之推演，近似西方之无政府主义。老子思想之推演，近似近代西方之民主政治”，与一般把老庄混谈的言论相比，这算是钱先生的一个相对中肯的观点。^③

冯友兰先生著的《中国哲学简史》是一部影响力很大的著作，是中国哲学

① 孙思昉：《老子政治思想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21、22、36页。

② 李石岑：《中国哲学十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8、101、128页。

③ 钱穆：《庄老通辨》，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25-140页；钱穆：《中国思想史》，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67、75页。

的开山作之一，其中有专章论述老子。冯先生把老子作为道家的第二阶段，放在杨朱之后，怀疑《老子》一书的真实性，与那时的学术环境有关。冯先生的论述主要放在老子的哲学思想上，对老子的政治思想的论述只有一千多字的篇幅。他把无为理解为不做事，而天下大乱，“不是因为有许多事情还没有做，而是因为已经做的事情太多了”。在作者看来，冯先生对老子政治思想的研究也很不够。^①

傅斯年先生也曾研究过老子，有《老子五千言之作者及宗旨》之论，差不多把老子思想等同于权术阴谋论，认为“五千言所谈者，大略两端：一道术，二权谋。此两端实亦一事，道术即是权谋之扩充，权谋亦即道术之实用”，对老子的政治思想知之不多。^②

萧公权先生认为，“‘无为’之政治哲学遂成为失望之有心人对于暴君苛政最微妙而最严重之抗议。虽然，老庄之政治思想并非完全消极，而自有其积极之成分……社会制度苟有不利于个人之自全自适者，则当裁抑之，损减之，以免枝叶之害及根本。老庄思想诚先秦为我思想之最精辟闳肆而富于条理者也”。萧先生对老子的政治哲学的精华——虚君民治——的分析甚为精准，对庄子的个人自由的思想评价也很高。但萧先生把老庄混为一谈，认为“全生适性乃老庄政治哲学之最后目的”，没有区别老子治国治天下与庄子全生的不同，又认为老子的思想与欧洲最彻底之放任主义相似，也是没有严格比较老子的“民四自”与欧洲放任主义的同与异。^③

侯外庐先生于1942年著有《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不仅在时间上把老子置于孔墨思想产生之后，又把老庄并列，还把道家的论述限于“反显学的智者学说”，显然有以古希腊时期“智者”之名贬老庄之意，认为“老子的历史观是反发展，他的道德论是反创造”。虽然对老子的政治思想涉及不多，但侯先生也肯定老子“敢于否定了‘先王’，则是人类思想的一大解放”。他认为《老子》书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6页。

② 傅斯年：《春秋策——先秦诸子与〈史记〉评述》，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年版，第102页。

③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66、171、176、187页。